



NANJING JINGJISHI LUNWEN XUAN

南京經濟史論文選

南京市人民政府經濟研究中心 编

南京出版社

书名题签：张耀华

特约编辑：陈耘

责任编辑：姚加宁

装帧设计：郭春明

主 编：赵玉麟 杨汉华

副主编：冯寿英 恽大年

目 录

- 鉴古知今 振兴南京 戴顺智 (1)
序 茅家琦 (1)

第一部分

- 六朝时期建康都城的商业 罗宗真 (3)
六朝时期建康手工业的发展 于翠云 (11)
南宋建康经济复苏探析 管玉春 (19)
明代南京经济探析 范金民 (27)
太平天国的天京商业 后文沫 (39)
南京丝织业兴衰的历史反思 茅家琦 林 刚 (49)
试论南京地区丝织业的发展 李蔚然 (65)
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基础 沈道齐 (71)
明清时期南京城市的发展与演变 陈忠平 (84)
南京工业近代化的历史道路 林 刚 唐文起 (100)
南京房地话今昔 汤乃庚 (110)
清代前期南京经济略论 范金民 (120)
南京近代工业的发展及其特征 陆仰渊 (133)
明初南京与海外的经济往来及其影响 管玉春 (145)
南京开埠通商的历史过程及其影响 唐文起 (158)
明清时期南京的徽商 周志斌 (168)
南京交通电信近代化的历史道路 顾纪瑞 (178)
南京近代公路的兴建 周一凡 (189)
秦淮河与南京的经济发展 陈至煌 郭黎安 (197)

- 清末南京港对外开放之回顾 吕华清 (206)
试论近代南京城乡经济关系 唐文起 林 刚 (215)
南京近代商业的发展 张士杰 (230)
南京与周围地区经济联系的历史发展
..... 藏 雷 丁小宇 (238)
解放前的南京物价风潮 陆仰渊 许宏伟 (249)

第二部分

- 南京产业结构演变四十年 俞 明 (257)
当代南京港口主要功能的形成与发展 吕华清 (273)
浅谈当代南京城乡经济关系 雍嘉祺 (282)
南京交通运输业四十年来的发展 刘建英 (292)
南京集体工业的发展历程 鲍启鑫 (301)
建国以来南京银行业变化与发展 何国雄 (311)
南京物资流通四十年变迁 吕笑熙 (321)
建国以来南京城镇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张福保 (331)
南京市个体经济发展的四十年 戴启麟 (342)
建国四十年来南京工业的发展 冯寿英 (351)
- 附录：简明南京历史大事年表 恽大年 (363)
- 后记 编 者 (366)

第一部分

六朝时期建康都城的商业

罗宗真

六朝时期（东吴、东晋、宋、齐、梁、陈），东吴建都建邺，大力兴建城市，开发交通，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西晋灭吴后，建康城并未遭到很大破坏，此后东晋、宋、齐、梁、陈相继在此建都。随着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经济繁荣，商业得到相应的发展。

一、建康为六朝时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

六朝时期因经济的发展，孕育了不少新兴城市，都城建康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也是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梁都之时，户二十八万，西至石头城（今清凉山），东至倪塘（今江宁县方山北面上坊陵里一带），南至石子岗（今雨花台），北过蒋山（即紫金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①，秦淮河两岸，还有不少市镇。建康城内有四市：“建康大市，孙权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斗场市，隆安中发乐营人交易，因成市也”^②，这都是三国两晋时已经成立的市场，同时成立的还有很多小市，主要的商业贸易都在市内进行。在梁朝侯景之乱前，建康的繁荣，可和长安、洛阳相比，素有“市廛刊肆，埒于二京”^③之称，足见其市场的繁华。只因后来战乱破坏，才逐渐衰落。

城市繁荣与城乡贸易有关，在广大农村和乡镇往往建有草市。东晋及南齐时建康城外就有草市，“置草市尉，有草市尉司察之”^④，当时草可能有“茭”之意，即草料之市。农民把草料（饲料，燃料）及农产品卖给城市居民，小商贩也来经营，

草市即集市的雏型。史书记建武四年(公元497年)尚书令，大将军王晏“至出草市，马惊走，鼓步从车而归”^⑥，可以为证。当时还规定，市设官吏（令、丞），商人中选出市魁，共同对市场进行管理，按商品种类分别建立店肆，这些店铺、房屋和有关设备都由官府供给，不准店肆错乱，偷税漏税，或垄断交通要地。

自汉末以来，全国东西、南北的交通均因长江横贯而沟通，临江的建康城，交通十分便利，六朝时尤为发达。它不仅是国内交通的要道，也是海外交通的港口。刘宋时“贡使商旅，方舟万计”^⑦。南齐初年，三吴各地水灾，而建康地区因交通方便，粮食可从各地运来，所以无饥馑之虞，甚至连粮价也未上涨。六朝时期，不少国家前来通商贸易，交流文化。东吴时孙权曾派人前往台湾和海南岛，并出使南洋诸国，到达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部）等地。这些国家也派来使者和商人，刘宋时林邑、扶南出使建康，送来金银和香布等；今印尼的诃罗陀国送来金刚指环、赤鸚鵡鸟、白叠古贝（棉布）等。狮子国（斯里兰卡）和天竺（印度）迦毗黎国不仅有贸易往来，还带来了佛经，有些高僧则住在建康传经译经。天竺各国和南朝关系最为密切，常派使节来建康，连大秦（东罗马）的商人也来建康通商。西域诸国，虽因南北分裂对峙，关系中断，但有些国家，如古嚙达汗国，曾三次遣使访问建康的梁朝，波斯（伊朗）萨珊王朝于梁武帝时两次遣使来建康。另外，日本、百济、高丽也先后数十次派遣使节来建康。这些国家的商船皆取道海上，有的沿江北上，有的由长江口直达建康。通过友好往来，中国的纺织、缝纫、制陶、养蚕、烹饪等技术，以至五经、佛像等文化艺术也先后传到诸国。进口的奇珍异物，首先集中到建康，除部分留存供统治阶级享用外，大量的作为商品进行贸易。例如齐武帝为太子时，亲信张景真

曾“度丝绵与昆仑舶营货”，说明当时和外商贸易的情况是十分活跃的。

二、六朝时建康商业发达的原因

六朝时建康商业发达，究其原因，可归纳如下几点：

一是人口增加。六朝时期建康人口稠密，梁武帝时户二十八万，如一户以五口计，即达一百四十万人。此数并不多估，因这时地主庄园内尚有许多庇荫户口未统计在内。由于人口集中，消费需求量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东吴时还没有按货物种类列市，到南朝已出现各种专门的市场，如牛马市、纱市等。

二是农业、手工业发达。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有了剩余的产品，势必要拿到市场上销售或交换，互通有无。

三是相对北方而言，南方社会环境较为安定，有利于贸易往来。

四是交通发达。特别是水运方便，利于运输大量货物，同时又开辟了海上通道，为对外贸易提供了条件。

北朝有人认为，“今伪弊相承，仍崇关鄙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①，即说明南方商业发达，税收甚丰，而北方不如。

三、六朝时建康商业的特征

六朝时期商业繁荣，主要还是对统治阶级有利，商业税收成了财政的重要收入，支撑着封建统治制度的运转。同时又为统治阶级发财致富开辟了一条有效途径。广大的士大夫官僚阶层可以免除税收，净得其利。而六朝时期货币制度多变，形式、内容混乱，也反映出当时朝廷更换频繁，政治混乱的局面。

(一) 货币混乱和经济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活跃，货币的需要量也逐渐增加。晋初沿用孙吴旧币，由于市上钱币缺乏，造成钱贵物贱的现象。东晋之末，有人建议弃钱而专用谷帛来交换，反映政府无力铸钱。宋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开署铸钱，但因为铜不易得，币质低劣，盗铸、改铸极为严重。梁代改铸铁钱，但大部州郡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一带则多用金银。梁陈之际，仅建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一带使用钱币：“自淮以北，千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⑨，则说明江淮地区以谷帛交换为主，钱币为辅。刘宋时一匹布可换八百个梨，汉川一带“悉以绢为货”^⑩，皆足为证。

六朝初期，皆用旧币。到元嘉七年(公元430年)才设立钱署，铸四铢钱，其形制和五铢钱同。由于成本较高，所铸不多，于是民间盗铸，或凿翦古钱取铜代钱。元嘉二十四年(公元447年)，曾实行“以一大钱(汉、吴所铸)当两(所铸四铢)”的办法，即古钱亦可流通。后来因弊害甚多而中止。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再铸四铢钱，形制更为薄小，民间盗铸尤剧，甚至杂以铅锡，致使物价上涨，人民怨恨。到了永光元年(公元465年)，钱币越来越劣，于是又铸二铢钱，币制更为混乱。同时又允许民间公开私铸，一发不可收拾。当时盗铸的钱没有轮廓，与翦凿者同，称为“来子”，往往一千钱不满三寸，称为鹅眼钱，更次的又称艇环钱，入水都不沉，到手可捏碎，“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⑪，后来就一并禁止。泰始二年(公元466年)，专用古钱，仍缺。及齐武帝永明八年(公元490年)，“遣使入蜀铸钱，得千余万，功费多，乃止”^⑫。由于钱币缺而价昂，布价反而低落。梁武帝时再行铸钱，一种五铢，一种五铢女钱(较前者为小，无内郭)，古钱亦复通用，轻重大小不

一，也是十分混乱。普通四年（公元523年）开始又铸铁钱，结果堆积如山，民不为用，交易者往往以贯为单位计价（千钱为贯）。侯景之乱后，铁钱不用，梁敬帝绍泰二年（公元556年）铸四柱铜钱，一当二十，后又改一当十。陈朝则用梁末两柱钱和鹅眼钱。天嘉五年（公元564年）改铸五铢钱，一当鹅眼钱十。太建十一年（公元579年）铸太货六铢，一当五铢十，又改一当一，最后又用五铢。

货币的混乱，反映了六朝政治的紊乱。用钱的是长江流域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金银交易与对外贸易有关，反映当时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广大农村农民需要把一部分产品投到市场上去换取自己所不能生产的物品，主要支付方式还是实物，钱币只是一种辅助形态。这说明六朝政治力量实际管辖的范围还是有限的，货币制度并未能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

（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交易

在广大农村和城市，官商往往结合，农民虽有小本经营，但仍以自然经济为主，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一旦遇到灾荒，天灾人祸降临之后，除了贱卖贵买之害外，又受高利贷的盘剥，城乡之间的贸易产生一种不平等的状况。六朝时实行高利贷的方法，主要通过传、屯、邸、冶中的邸舍或邸店来进行。邸舍是一种存放堆积物资和洽谈生意的场所，往往操纵在官僚手中。官僚富商“皆置邸舍，逐十一之利，为患遍天下，……列肆贩卖，古人所非”^⑩，高利贷之危害，为当时人民所患。梁朝宗室萧宏居然“都下有数十郡，出悬钱立券，每以田舍邸店，悬上文券。期讫，便驱券主，夺其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⑪，他驱使人民以田宅邸店为抵押品，如不能还债，则夺人田宅。大邸吞并小邸，其剥削手段十分残酷。当时官吏也设邸放债，“府、州、郡邸舍，非臣私有，今巨细所

资，悉是公润”^⑩，至于私人放高利贷，更是不胜枚举。当时放债都立文券，以作凭证，借钱一百，收价值千钱的米一斛；如米贱时则收十倍的钱。吴郡顾倬放债所存文书券有一大橱，可见其剥削之甚。由于官僚地主、世家大族的盘剥，城乡贸易实际呈一种畸形状态，同时受到自然经济的约束，其发展是很不充分的。

（三）商税成为封建政府的重要收入

由于南方经济的发达，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日益增多，市场也趋活跃，因之商税成了政府的重要收入之一。例如买卖牛马、田宅、奴隶等巨额交易一定要有文券，每一万钱抽税钱四百，买方出一百，卖方出三百，称为“输估”；无文券的小额交易值百抽四，称为“散估”；此外还需付关津税、市税等等。例如有关卡的渡口，货物抽十分之一的关津税。当时买卖货物一般都要立文书，以收市税。

（四）商业为封建的统治阶级服务

六朝的商业虽然发达，但有一显著特点，即商业为封建政府和官僚贵族所把持操纵。例如南北互市、对外贸易，均由官府掌握，上自皇帝、下至地方官吏，他们都是亦官亦商。宋少帝刘义符，在华林园开设店肆，亲自沽卖；齐东昏侯萧宝卷，于苑中立市，令官人沽卖酒肉，使潘妃为市令，而自为市吏录事，有闹事者就潘妃罚之；同时又开渠立埭，自己引船，在埭上设店卖肉。陈后主甚至写出《估客乐》的诗句：“三江结俦侣，万里不辞逸，恒隋鹢首舫，屡逐鸡鸣潮”^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些官吏也竞为仿效。宋孝武帝诸子，都会做生意，史书说他们均“逐什一之利”。陈朝各地官吏也竞相聚敛兴利，大做买卖。士族大官僚孔𫖮的弟弟孔道存和孔微，做官

回来，带回“辎重十余船，皆是绢绵纸席之属”^⑩再行卖出，牟取暴利。又如《南史·恩幸沈客卿传》说：“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即反映士族一向可享特权免税。再如上述顾頡之子顾绰大放高利贷，小自一束苧，大至黄金首饰，都可拿到建康的寺院库房质钱，这可说是我国典当业的开始。民间商业和商人获利虽不及官僚，但人数亦不少。民间经商中有农民兼营或弃农经商的，但他们多半从事一些小本生意。一些大商人，特别是豪商巨富，可以穿裘貂狐缇绣，出入官府，甚至由商而官，往往形成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这也是六朝时期建康商业的一个特点。那时市场上大都是绵、绢、纸、席之类，坐市肆贩卖者大部分是平民及其家族。而王公贵戚、官僚地主等都从事货物囤集或以土产贩运操纵市场，这无非是将其庄园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推销出去，以取暴利；或利用其政治地位，免去税收和关卡盘查，贩卖一些非法违禁品。所以严格地说，这一时期的商业，仍是在封建制度范围内及地方庄园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业，是为封建统治制度服务的。

六朝时期的经济是中国传统封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一直是以农业为本的小农经济，实质上就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虽然有“商旅转繁，游食转众，耕夫日少，杼轴其空”^⑪的局部情况，和陈末“人竟商贩，不为田业”^⑫的暂时现象，这绝不能否定“一夫躬稼，则余粮委室，四妇务织，则兼衣被体”^⑬的根本面貌。所以，当时的商业发达，只是较前代进步而已。

注：

①《资治通鉴·梁纪十八引“金陵记”》。

②《太平御览·资产部七·引“丹阳记”》。

③《隋书·地理志》。

④《资治通鉴·齐纪和帝中兴元年条》。

- ⑥《南齐书·五行志》。
- ⑥《宋书·五行志》。
- ⑦《魏书·甄琛传》。
- ⑧《宋书·王玄谟传》。
- ⑨《宋书·刘秀之传》。
- ⑩《宋书·颜竣传》。
- ⑪《南齐书·刘俊传》。
- ⑫《宋书·沈怀文传》。
- ⑬《南史·临川王宏传》。
- ⑭《南齐书·豫章王嶷传》。
- ⑮《全陈诗·卷一》。
- ⑯《宋书·孔𫖮传》。
- ⑰《南史·郭祖深传》。
- ⑱《隋书·食货志》。
- ⑲《宋书·谢瞻·孔琳之传》。

六朝时期建康手工业的发展

于翠云

自公元229年孙权建都开始，历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建康（东吴时称建业）是六朝都城，是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320多年间，建康不仅是京师，还是丹阳郡治和扬州州治的所在（当时的扬州辖地包括今苏南、浙江和皖南部分地区）。这一地区同北方比较，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纺织、矿冶、制瓷、造纸、造船、建筑等手工业都有重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官办手工业迅速兴起

六朝时期，为了满足皇室、官府和都城居民的生活需要，在建康城设立了许多官营手工业作坊。主要有：

纺织业：远在春秋时，江南就有种桑养蚕的历史，但在三国之前，江南养蚕缫丝主要是民间的家庭手工业。自东吴开始，建业有了官营的纺织手工业，并从各地征调数以千计的熟练工人到都城，充实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其规模日益扩大。陆凯曾上疏谏后主孙皓说：“先帝时，后宫列女，及诸织络，数不满百，……先帝崩后，更改奢侈，伏闻织络及诸徒坐，乃有千数”^①。吴末景帝时，后宫的纺织女工等工匠，已由吴大帝孙权时的“数不满百”增加到“千数”了。南朝各代都设有少府，在少府之下设平准令，掌管织染之事，扩充官营纺织手工业，大力生产各种丝织物。

东晋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东晋大将刘裕率军攻破后秦都城长安，将关中的官营手工业作坊中的织锦工匠等南

迁，在建康城南斗场市（今雨花台一带）设立锦署。从此，建康有了织锦业，锦署遂成为南朝官府织锦手工业的常设机构。

矿冶业：主要是铸造货币、兵器和生产工具。六朝在江南有采冶的州郡设冶令、冶丞，管理冶铸。东吴在建业城西南的冶城山设立官冶作坊，冶炼和铸造铜铁器，曾两次铸造“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等铜钱。东晋时，建康发展为冶铸中心，设立主管冶铸手工业的部门有东冶、西冶和左、右“尚方”，由皇室直接掌握的手工业作坊和官府的冶炼作坊有8处以上。与建康相近的梅根冶（今安徽贵池县东）和永世县的铁岘山（今江苏溧阳县南）是2处规模较大的铜铁矿区。刘宋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开始，南朝在建康设立铸钱的钱署，铸造铜质的“二铢钱”、“四铢钱”、“五铢钱”、“六铢钱”。梁时还铸造过铁质的“五铢钱”。三十年代，曾在南京光华门外发现大量梁代铸造的五铢钱泥范，证明那里曾是南朝重要的冶铸作坊之一。

陶瓷业：六朝时陶器制作发展到青瓷阶段。在建康都城西南的秦淮河畔，设有官营的陶器作坊，在会稽等地设青瓷器作坊，大量生产陶瓷器。

造纸业：六朝官府为大量生产高质量的纸，在建康城东设纸官署。纸官署曾制成著名的“银光纸”。

造船业：六朝时，为了适应水战和江海交通贸易的需要，官府重视发展造船业，东吴开始设典船都尉，派赴各地造船场，监督工匠及罪犯造船。

从以上可以看出，六朝时期建康官营手工业已相当发达。手工业作坊中的工匠，大多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工奴和工婢，生产积极性很低。但是，由于集中在一起生产，进行专业分工，可以相互交流生产经验，传授工艺技术，有利于手工业技术的改进和提高。

二、手工业的技术有重大突破

纺织技术有重大改进。六朝时，人民衣着以麻布为主，江南农妇绩麻织布技术熟练，出现了“夜浣纱而且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②。养蚕缫丝方面，东吴时对养蚕温度、用桑、蚕座、上簇等技术，都有严格的要求。当时缫丝质量很好，诸暨、永安等地可以生产专供宫廷丝织用的高级“御丝”。丝织物的花纹繁多，吴王赵夫人能织成龙凤和五岳列国地形的织锦。东晋、南朝，纺织普遍采用自三国开始的一蹑鼓动数综的先进机织方法。梁时，嵌镶金薄的罗，织得十分精美。据《吴越钱氏志》记载，南朝时丝织物的织文图案有“天、人、鬼、神、龙、象、宫殿之属，穷极巧妙，不可言状。”南朝江南的纺织技术，闻名国内外，塞外的芮芮王曾向南朝求锦工。刘宋时，日本八次遣使建康，邀请南朝的织工、缝纫工东渡日本，对日本的纺织、缝纫技术的提高，起了促进作用。

南朝时，已广泛使用水力（水排）鼓风炉冶铁，刘宋元嘉初有发水冶（水排）的记载。尤其是炼钢技术取得了划时代进步。齐梁时，炼钢匠师谢平（浙江上虞人）所作的钢朴和右尚方凿镂匠黄文庆造的刀剑，并称“中国绝手”^③。当时官营冶坊生产出百炼的“横法钢”，用这种钢制成的宝刀叫做“百炼钢刀”，极其锋利精巧。但是“横法钢”的冶炼非常费工，成本高，不适用于广泛制作生产工具。南朝发明的“灌钢”冶炼法是炼钢技术的新创造。梁朝陶弘景说：“钢铁是杂炼生（生铁）鍤（熟铁）作刀镰者”^④。这种杂炼生鍤的炼钢法，即所谓“灌钢法”，它是将生铁和熟铁混合放置炉中冶炼，火力到时，由于生铁含炭量高和熔点低，生铁熔化后包裹和渗入熟铁，生铁多余的炭素被缺少炭素的熟铁所吸收，也排挤出一些熟铁所含的熔渣，生熟铁熔化后，再经反复锻打锤炼，便成为